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

王会昌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武汉 430070)

提 要 论述了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

关键词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 气候变化 南迁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王朝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而伴随着军事征讨,形成波涛滚滚的历史大潮,越长城,席卷中原,激荡江淮,波及全国,秦汉时代偏居塞外的北方游牧民族到汉魏六朝之际开始割占中原,至两宋时代一统黄河流域,蒙元帝国和大清王室先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牧者王朝”。在历史大潮的间歇期,游牧人遁居塞外,黄河—长江流域无风尘之警,天下太平。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原农业王朝国势鼎盛,“偃武修文”,登上了世界封建文化的顶峰。历代王朝治乱相间、盛衰更迭,周期循环,游牧人步步南迁、冲击华夏神州。本文试图从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角度,探讨上述问题。

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历史过程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1]提供的历代行政区划沿革情况,系统研究了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南迁过程中所建立的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N)变化(表1),游牧民族的南下过程大致可划分4个阶段。

1.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偏居塞外

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它的南方屹立着封建农业文明大国。北方游牧民族时时侵扰秦汉王朝北疆,秦将蒙恬和汉将卫青、霍去病等驰骋大漠,追歼犯境铁骑。游牧民族和农耕政权两个世界的界线基本上维持在长城一带。

1.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割占黄河流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从三国鼎立到司马炎代魏立晋的近百年间,匈奴、鲜卑、羯、

* 本文所指“游牧民族政权”含义包括:独立的游牧民族政权;藩属统一的中央农业王朝时期,在王朝内部所建立的具有民族自治性质的地方民族政权;元、清“牧者王朝”时期的中央政权亦暂归此类。

氐和羌族纷纷内迁。晋室偏安江南,内迁各族则割占中原,相互混战,黄河流域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前秦疆域南界推进到淮河一线($32^{\circ}18'N$)。到南北朝后期,北齐政权的南界甚至扩展到长江岸边($30^{\circ}24'N$),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南北“画江而治”的政治格局。

表 1 历代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

Table 1 The latitudinal variations of the southern boundaries of the state power for nomadic nationalities through the ages.

阶段	时代	政权界线(北 南)	纬度(N)	相当于今地名
I	秦	匈奴 /上谷郡	$41^{\circ}42'$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炮台营子
	西汉	乌桓 幽州刺史部上谷郡	$41^{\circ}18'$	河北省张家口市二台东
	东汉	鲜卑 幽州刺史部上谷郡	$40^{\circ}56'$	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北
II	三国	鲜卑 魏 幽州上谷郡	$40^{\circ}56'$	同上
	西晋	鲜卑 幽州上谷郡	$40^{\circ}56'$	同上
	东晋	前秦 /东晋 豫州弋阳郡	$32^{\circ}18'$	河南省息县临河镇
	南北朝	北朝 北齐 南朝 陈	$30^{\circ}24'$	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镇
间歇期	隋	突厥 涿郡	$44^{\circ}0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南
	唐	回纥 河北道 勉州	$43^{\circ}3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查干诺尔
III	五代十国	契丹 北周	$39^{\circ}24'$	河北省涞源县塔崖驿
	北宋	辽 北宋	$39^{\circ}6'$	河北省易县南管头
	南宋	金 南宋	$32^{\circ}18'$	河南省息县临河镇
IV	元	中国大陆南缘	$22^{\circ}30'$	广东省惠东县港口
	明	鞑靼 京师开平卫	$42^{\circ}4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北
	清	中国大陆南缘	$22^{\circ}30'$	广东省惠东县港口

注: (1)以 $115^{\circ}00'E$ 经线上的纬度变化为准; (2)元、清二朝只取中国大陆纬度

1.3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王朝长期分庭抗礼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还只是混乱而短暂地占据黄河流域的话,到宋、辽、金时期,从辽与北宋的对峙(边界在河北省中部的 $39^{\circ}N$ 附近的淮河一线)都表明,一个单独的游牧民族政权已经能够稳居黄河流域并敢于同农业王朝分庭抗礼。

1.4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业王朝

从蒙元帝国到满清政权(其中明朝为例外)时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业王朝。公元13世纪,欧亚大陆的游牧人之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半个世纪中,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倾覆了宋室江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牧者王朝”。农耕世界的臣民听命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背君王。在朱明灭元270a之后,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登上金銮宝座,建立了第二个“牧者王朝”。

隋唐时代为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间歇期。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象秦汉时代的匈奴一样,遁居塞外,政治上虽相对独立,但仍藩属中原王朝统治。中原王朝国势鼎盛,政权稳定,呈现相对太平景象。

2 2000a来的气候变化

将数千年来气候的冷暖波动(图1a)^[2]、干湿变化(图1b)^[3]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图1c)三者用一个时间坐标绘制在同一图上后发现,无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

最近四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3个主要的温暖湿润时期 第1个暖湿期为“仰韶暖期”(约3000a D. C. ~ 1000a D. C.),它与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相对应 黄河中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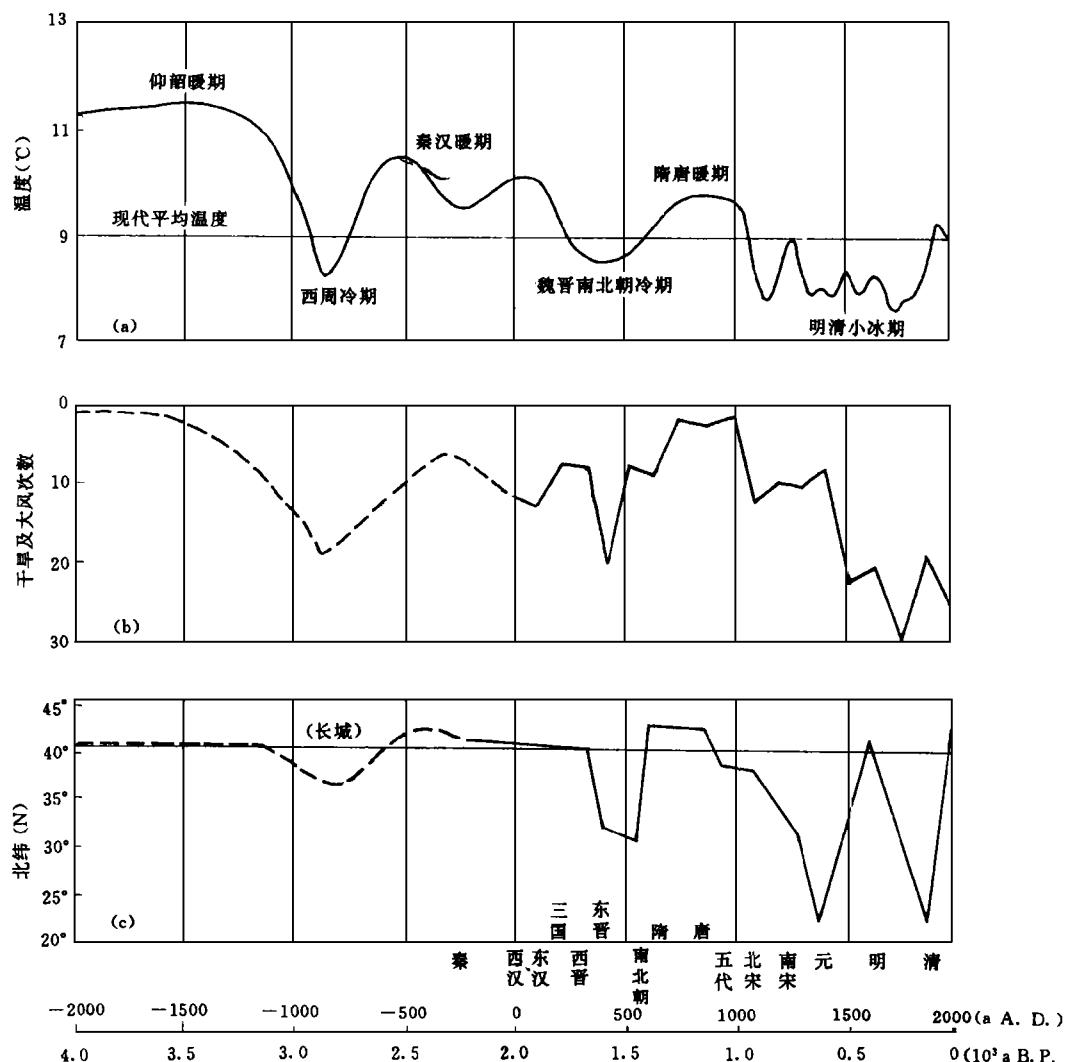


图1 4000a来我国气候的冷暖波动 (a)干湿变化 (b)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纬度变化 (c)的关系。

Fig. 1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itudinal variations of southern boundaries of the state power for nomadic nationalities (c) and the climatic changes both in cold-warm (a) and dry-wet (b) since 4000 years.

游地区当时为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高出现代 $2^{\circ}\text{C} \sim 3^{\circ}\text{C}$ 。先民在这里创造了仰韶 - 龙山农业文化,继而出现了光辉的黄河流域文明。秦汉时代为第2个暖湿期(770a D. C. ~ 公元初)。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生长于黄河流域的桔、竹、漆和桑等亚热带经济作物今天在这里已无法种植。历时七、八百年的温暖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第3个暖期为“隋唐暖期”(600a A. D. ~ 1000a A. D.)。对应于

欧洲的“中世纪暖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国都长安的冬季无冰无雪，梅、桔等亦可在皇宫中生长。结果，由于黄河流域雨量丰沛，水利事业发达，农业丰收，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综上所述，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的大一统农业王朝时代，都与上述的气候暖湿时期大体一致。

与暖湿气候期相间隔，2000a来中国气候经历了3个寒冷干旱时期。第1个寒冷期为西周冷期（1000a D. C. ~ 850a D. C.），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第1个文化层与该时期相当。其环境考古分析表明，当时气温明显下降^[4]。《竹书纪年》中有周孝王七年（903a D. C.）江、汉结冰的记载。第2个寒冷期为魏晋南北朝冷期（公元初~ 600a A. D.），当时的年均温比现代低2℃~ 4℃。《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物候，约比今天推迟10d~ 15d。这次冷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动乱岁月。第3次寒冷期出现在北宋初年到清末（1000a A. D. ~ 1900a A. D.），其中北宋初年到南宋中叶的100a出现了本次寒冷期中第1次明显的降温；南宋中叶到元朝初年（1200a A. D. ~ 1300a A. D.）有1个短暂的回暖期；从15世纪开始，气候进一步向干冷方向演进，直到20世纪初气温才有所回升。最后这个连续500a的干冷阶段，即为“明清小冰期”，其中17世纪最为寒冷，尤以1650a A. D. ~ 1700a A. D.最甚，形成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气温下降的最低谷。黄河流域从1627年到164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14a的流域性干旱。第3次寒冷期几乎经历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1000a。它最初引发了辽、金与宋室江山的对峙，后期导致元、清两代“牧者王朝”对黄河—长江流域农耕世界的统治。

由此可见，最近几千年来我国气候虽然表现出以数百年时间尺度为周期的冷暖波动，但总的的趋势是暖期不断缩短，冷期愈来愈长，冷期降温的幅度逐渐加大。如，“仰韶暖期”历时几千年，秦汉暖期延续七、八百年，而“隋唐暖期”只有三、四百年。相反，最初的西周冷期只有100多年，魏晋南北朝冷期则经历五、六百年，而第3次寒冷期则长达八、九百年，到17世纪中叶又形成了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最寒冷的气候。

众所周知，中国季风气候的特征表现为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历史时期亦复如此。因此，最近几千年来，由于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历史时期以来我国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根据历史上的旱涝记载，我国北方在9世纪以前，干旱年份出现的几率不超过1%；9~14世纪增加到2%；15~17世纪上升到43%；18世纪则为46%，干旱年份几乎隔年出现。若以1000a A. D.为界，将最近的2000a分成前后2期，那么前期干旱的年份共计350a（占35%），湿润年份共计650a（占65%），显然以湿润为主。后期900a间，干旱年份为580a（占64%），湿润年份只有320a（占36%），显然以干旱为主。尤其是处于明清小冰期间的1431a A. D. ~ 1820a A. D.的390a间，旱期竟长达320a^[5]。图1b中最近几千年干旱及大风出现次数的曲线再现了日益干旱的趋势。

如果将我国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历代王朝的兴衰荣枯进行对应分析，发现，正是由于2000多年来温暖湿润气候期的不断缩短，寒冷干旱气候期的不断延长和干旱化程度的日益严重，才一次又一次引发了塞外游牧民族步步深入到黄河—长江流域。

3 气候变化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中的作用

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鸿儒董仲舒（179a A. D. ~ 104a D. C.）就在著名的《对贤良策一》中提出了试图解释天人关系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董仲舒是将其天人感应说作为建立封建神学体系基础，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是唯心主义观。

点,应当遭到人们的摈弃。然而他从天人关系出发考虑自然界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模式,不能说绝无可取之处。尽管天不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更不表示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然而,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于从事农耕和游牧的民族来讲,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代,不可能不对其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势的强弱、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乃至游牧人与中原农耕世界的关系。当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旱以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农业王朝必然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农业歉收,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阶段矛盾激化,国势一天天衰微。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冷变干同样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向南部的农耕世界发起攻击,寻找扩大新的宜牧地区。尽管游牧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军事组织才能和人口的数量、素质方面都落后于农业民族,但其强悍的民族性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军事优势是农业民族所无法比拟的^[6]。而此时,中原农业王朝又因国势衰微无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势,弃都南逃,偏安江南,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寒冷气候周期的延长和寒冷程度的加剧,促使北方游牧民族向农耕世界的进攻,中原农业政权步步退却,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农耕世界的王朝。

寒冷气候结束之后,温暖气候期接踵而至,黄河流域气温回升,降水增加,农业复苏,经济发展,国势增强,出现太平盛世。游牧人退出中原,重返这时同样水草丰美的草原世界。两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彼此进行和平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

应当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的兴衰更迭、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气候的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发展的方式、方向、速度和进程。在历史过程中,应该承认气候-生态-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或反馈机制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纵观2000多年的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因此,中国历史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参 考 文 献

- 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各册有关部分
- 2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B辑),1973,(2): 226~256
- 3 徐馨,等.全新世环境.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228
- 4 贾兰波,等.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中的动物群.文物,1977,(6): 41~49
- 5 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2000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见:中央气象局研究所.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29~32
- 6 世界历史编辑部.吴于廑谈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世界历史,1983,(1): 1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GRATING SOUTH OF THE NOMADIC NATI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AND THE CLIMATIC CHANGES

Wang Huicha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grating south of the nomadic nati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and the climatic changes is studied. In the warm period the nomadic nationalities dwelt in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lived together in peace with the agricultural nationality dwelt in the Central Plains (comprising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However the in cold period the nomadic nationalities lauched an all-out offensive on agricultural world because the forage grass withered, the water source had dried up in the prairi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agricultural world was also hit by the cold climate, the agriculture drop in production, the economy depressed, the national power declined. Thus, they cannot sustain the blows from nomadic world. Because the period of cold climate got longer and longer, and the degree of cold climate got bigger and bigger in recent 2000 years, the extent of migrating south of the nomadic nationalities became larger and larger. In fact as early as the Han Dynasty the the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s world" had been founded. The theory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feedback mechanism of climate-ecology-economy-society.

Key Words Nomadic nationality power; Climatic change; Migrating south

(收稿日期: 1995- 10- 26,修回日期, 1996- 06- 15)